

文科大学的综合化

——香港中文大学的案例研究

周光礼, 赵亚丽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已近60年,发展历程可分为创校时期、联邦制时期、转型时期、融合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其综合化在前三阶段主要表现为学科数量增加和外延扩张,在最后阶段主要表现为学科融合创新与内涵发展,由此从单纯文理教育为主到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今日已成为诸学科完备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任何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其综合化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科综合化遵循两种基本逻辑:同构逻辑强调变革须适应环境变迁,在每次经济社会转型时都能及时变革学科和组织结构;分化逻辑重视大学变革的历史延续性及独特认知方式,表现为坚守文化传统和内在逻辑。

关键词: 香港中文大学; 学科综合化; 组织变革

中图分类号: G648.1; G6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21)03-0042-08

The Integration of a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HOU Guang-li, ZHAO Ya-li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6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namely, the founding period, the federalism period,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period. The first three stages are about discipline expansion, showing as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isciplines and extension expansion; the latter stage is abou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demonstrating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ny university is the product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and its comprehensiveness embodies the dialectics of change and immutability. Its change is reflected in the timely disciplinar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 in each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while its constancy is reflected in the adherence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nternal logic.

Key word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收稿日期: 2021-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AGA190011)

作者简介: 周光礼(1970—),男,湖南武冈人,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大学与学科评价研究;赵亚丽(1987—),女,河南开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大学综合化是全球性趋势。从人才培养角度看,现代社会亟须大批具有跨界整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大学教育需从“基于学科的教育”向“学科交叉的教育”转变。从科学研究角度看,现代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大学需从“单一学科背景的知识生产”向“多学科背景的知识生产”转变。从社会服务角度看,随着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只有综合化、多元化、系统化才能满足社会的多样性需求。事实上,从单科性大学到多科性大学进而发展成综合性大学,是许多理工见长一流大学转型的基本路径,如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就是从一所单纯的工学院经理工见长的多科性大学阶段最终发展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本文指称的大学综合化,是指一所大学将不同学科聚合在一起,并通过交叉重组将不同学科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作为大学的一种类型,综合性大学主要根据其学科覆盖面来界定。美国卡内基大学分类体系就依据“知识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将综合性大学界定为能够在多个学科领域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大学。就知识生产广度而言,综合性大学一般含有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同时至少在一个或多个领域提供职业教育;就知识生产深度而言,综合性大学一般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能在多个学科领域授予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文科见长的大学能否转型为综合性大学?如何转型为综合性大学?学界对此问题的探究不多,本文结合一所文科大学学科扩展与融合创新的案例研究,旨在说明文科见长的大学如何实现综合化转型。

一、大学变革的基本逻辑

阿什比曾经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这是教育生态学的基本洞见。大学作为一个有机体,变革发展既受制于自身内部传承(“遗传”因素),又受制于政治、经济等宏观背景(环境因素)。因此,可从“遗传”与“环境”两个方面寻找大学变革的基本逻辑。

从环境角度看,大学变革的基本逻辑是同构逻辑。同构逻辑强调大学变革的趋同态势,即大学变革是在相同外部环境下大学组织的同构过程。^[2]同构逻辑表明,大学变革必须与环境变迁方式相适应,变化的环境是组织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也就是说,同构性逻辑承认环境的挑战,当遇到“变化着的环境”时,大学系统受到冲击而一定程度失衡,大学组织必然自我调整来适应新环境。其中,宏观政治经

济结构是环境因素的主导成分,具有限制任何组织背离现状太远的能力。据此我们可以说,大学变革受制于宏观社会结构,具体表现为大学组织与宏观体制与结构具有一定同构性。大学组织与外部环境同构的发生机制是:大学组织不但要为资源展开竞争,而且要为政治权力和制度合法性展开竞争,以获得经济和社会正当性。这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同构。正如制度学派所言,合法性同构主要源于组织所面临的正式的或非正式压力,这些压力要么来源于这个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如政府),要么来源于组织运作所处社会环境的文化期望。^[3]根据同构逻辑,大学变革主要受两种力量的推动。第一是环境变迁。作为一个资源依赖型组织,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外在物质环境。当大学所依赖组织的一个或多个对学校的期望和要求在某方面发生改变时,就会发生环境变迁。环境变迁是大学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常常表现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变化。根据环境变迁的激烈程度,大学变革可表现为渐进性演进和断裂性突变两种类型。第二是环境的复归。这是指当一所大学的活动偏离人们所接受的制度规范如此之远,以至它在制度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环境就会对该大学施加压力,使其回归人们所接受的标准。这是一种合法性同构压力,旨在使大学与主流社会普遍接受的大学概念保持一致性,从而使一所大学与其他大学在组织上大致相似。^[4]

从遗传角度看,大学变革的基本逻辑是分化逻辑。分化逻辑强调大学变革不仅受特定民族国家文化和政策的影响,大学组织自身特定的文化遗产和认知方式也塑造其应对当前变革和挑战的方式,即大学变革是大学对环境的能动应对过程,面对相同的环境,不同大学会产生不同的变革形式和类型。^[5]事实上,大学在面临变化着的环境时有两种基本应对方式,一种是放弃传统,适应新环境,另一种是坚守传统,改造环境。前者重视环境的作用,后者强调遗传的重要性。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前校长杜德斯达所言:“一方面,大学组织的转型必须重视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大学组织转型也可以改变大学所处的环境”^[6]。在国际化背景下,分化逻辑强调全球不同组织有不同的、多样的反应,关注全球环境在本土造成的影响和结果,重视自下而上的转化、调解、抵制,是一种非线性、非决定论的过程。^[7]根据转化逻辑,大学变革有两种内在机制。一种是认知机制,强调行动者认知方式在大学变革中的作用,即强调组织中行动者的感知和理解活动会导致组织不同的反应和结果。认知机制关注制度内成员作决策时如何

在其意义结构和“框架”内认识外部环境。它的核心假定是,组织内成员的感知方式已被培养成同一类型,他们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解释环境信息。认知机制承认变化着的环境推动了大学组织变革,但对环境的感知严重依赖组织行动者的接收、选择、理解、合并、重构。换言之,大学变革需要校长等关键行动者根据组织文化、行动和目的的知识情景来进行。^[8]认知机制常把大学变革理解为大学范式的转变,即大学核心信仰和价值体系的转变。“组织变革是范式的转变。组织范式被定义为一套世界观或意义框架,组织变革是组织核心信仰和价值体系的转变。”^[9]另一种是积淀机制,强调制度的历史累积和延续,认为大学变革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呈现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当前大学实践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在当前实践中埋藏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层次的价值和理解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高等教育是与这个地方的环境模式相适应的。

文科大学的综合化变革也可从遗传与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一方面,文科大学综合化的动力来自外部环境,综合化是一个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过程。随着外部社会产业形态由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创新密集型转型,大学必须综合化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在全球化时代流行一个“神话”,即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种观念影响了全球大学的变革与转型。另一个方面,文科大学综合化的动力也来自组织内部的行动者,综合化也是一个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过程。随着古典人文教育向现代学术教育转型,组织内的行动者日益坚信大学的本质特征是高深学问。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导致学科日益分化,学科数量越来越多,学院数也越来越多,而学科之间的联系却越来越少,学院之间也日益疏远。学科和学院的高度分化呼唤大学的综合化。由此可见,文科大学的综合化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

二、香港中文大学的变革与转型

香港中文大学(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是一所亚洲顶尖、享誉国际的公立研究型综合大学,在中国研究、生物医学、信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居国际一流水平,也是中国香港地区唯一所有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及图灵奖得主任教的大学。该校以“结合传

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以书院制、中英兼重和多元文化为特色。香港中文大学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于1963年合并而成;1966年成立香港第一所研究院(研究生院);1976年整合不同书院的学系,由大学统一负责;1986年全面调整课程结构,改用学分制并加强通识教育;1998年率全港之先录取内地本科生;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2020年6月10日发布的2021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43名。香港中文大学由一所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大学转型为文、理、工、医诸学科齐全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其近6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 创校时期:遗传基因形成(1949—196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内地部分人因政治变化南下到香港,使得香港人口暴涨,从1947年末的180万增加至1949年的250万。^[10]伴随人口数量增长,人口构成和教育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大部分内地到港人员都讲中文,所以对中文授课各类教育的需求激增。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香港问题未能及时解决,以前赴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路径受阻^①,这也加大了香港社会对中文授课高等教育机构的需求。

在移居香港的人群中有不少出色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们开办了很多“难民学校”,讲授专上程度(相当于内地高等教育阶段)的课程,帮助南下及本地青年继续学业。香港中文大学的三所创始书院——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新亚书院的前身是亚洲文商专科夜校,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著名学者于1949年创办,以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沟通东西文化为教育宗旨,书院获得了美国雅礼协会、美国亚洲协会、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的支持。崇基学院由前广州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董会主席欧伟国、香港圣公会领袖何明华于1951年创办,因代表基督教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传统的延续而广获英国、美国、加拿大及本地教会的支持,是三所书院中办学条件较稳定的一所。联合书院由平正、华侨、广侨、文化、光夏五所书院组成,除平正在香港创办之外,其余四所书院均是从广州或邻近地区南迁来港的私立学府,且都带来了一批原校教师和学生。1956年6月,五所书院组成香港联合书院,接受亚洲协会和孟氏基金会的经济支持。由此可见,三所创始书院早期均为私人办学且都接受了国外协会和基金会的经济支持。应该说实力强大的基金会是推动香港地

区大学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接受其资助意味着放弃部分学术自由。在创办香港中文大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亚洲基金会。在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指导下,亚洲基金会自1951年起就在亚洲广泛开展文化和社会活动,并对中文高等教育倾注了非同寻常的热情。亚洲冷战的初始十年,香港是亚洲基金会的重点活动区域,华人是亚洲基金会的重要目标群体。事实上,推动创建香港中文大学是亚洲基金会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11]

当时在香港,包括三所书院在内的“私人专上学校”均无资格颁发学位,受港英政府承认且有资格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只有香港大学,社会上要求设立中文为授课语言的大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初港英政府在研究解决高等教育问题时并未接受另设一所中文大学的建议,而是让香港大学在短时间内尽快开设中文为授课语言的文理课程,但决议并未实施。1957年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由蒋法贤担任主席,争取港英政府承认三所书院的颁授学位资格,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宏观经济社会结构变迁是新大学成立的主要驱动力。在经济层面,20世纪50年代香港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的自力更生国策以及倾向苏联的对外经济政策导致香港与内地贸易停顿,香港经济由百年转口贸易逐渐转向出口型轻工业。到工业化顶峰时(1981年),全港工厂超过4万间,雇用工人约100万,占总就业人数一半左右,GDP直接贡献率达30%。^[12]在社会层面,大批不为香港政府承认的专上学校的发展大大缓解了香港高等教育面临的压力,但港英政府不认可专上学校毕业生身份也导致大量人才流失,这对当时亟须大量技能型人才的香港经济来说是巨大损失。同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加大了拉拢和争夺东南亚华人的力度。传统上东南亚华裔学生在完成中学教育后一般选择赴大陆高等学校就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亦实施了积极吸纳侨生的政策。因此,亚洲基金会关注香港中文书院,除了解决南下青年和学者的问题以外,更是为了解决整个东南亚华裔学生的高等教育问题。^[13]高等教育发展要适应经济社会变革与转型,这也是摆在港英政府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经过各方不断努力和磋商,1958年港英政府接受了新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建议,进而于1959年正式资助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决定以其作为新大学的创始成员书院。

1960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校校长富尔敦爵

士以顾问身份来港考察,随后提交了《香港专上学院发展报告书》,强调“学术自由”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肯定新大学以中文为授课语言以及发挥文化桥梁的作用。1961年香港政府委任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初步筹划大学校址、建设等事宜。1962年,由富尔敦爵士主持、国际学者组成的富尔敦委员会成立,旨在审定三院的水准,确定新大学的组织架构。1963年富尔敦委员会发表《富尔敦报告书》,明确提出以“邦联制”为三所书院组成大学的模式。《报告书》发表后,港英政府委任20人组成临时校董会,由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关祖尧担任主席,确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聘任兼具中西学术背景且与社会各界关系良好的李卓敏博士为校长。1963年9月15日,立法局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条例》。1963年10月17日,港督柏立基(大学监督)在香港大会堂主持举行了大学成立典礼,长达15年的建校历程至此终告完成。

大学早期的信念和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后来的发展,这是遗传的作用。新亚书院以中文教学并开办公立学校缺乏的中国文化课程,致力于中国儒学的复兴及宋代书院文化的延续。崇基学院继承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传统,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融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以培养具有世界文化视野的人才为宗旨。联合书院秉承“明德新民”校训,肩负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通过全人教育及群体生活提升学生的品德情操,为香港社会、全中国乃至全人类服务。三所书院共同倡导的人文主义和通识教育直接塑造了香港中文大学“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基因。建立与发展香港中文大学的三股力量——中国知识分子、港英政府和美援机构,均对其文化基因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2. 联邦制时期:应用文科的发展(1963—1976)

香港中文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李卓敏的带领下迅速发展为一所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大学,学校的发展理念在这时基本成型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香港中文大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发展应用文科。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初设有文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院三个学院,主要有中文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美术、地理、历史、哲学、宗教、教育、生物、化学、数学、物理、经济、商业、工商管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17个专业,以文理教育为主,商科和社会科学相关专业教育较少。当时香港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需要大量文员,工程技术教育需求并不大。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在原

分设于三所书院的商学院、经济及工商管理学系基础上成立工商管理学院,下设三个学系,包括会计及财务、企业管理及人事管理、市场及国际企业,扩展了应用文科专业。

二是引入科层管理模式。由于建校时采用较松散的邦联制,香港中文大学一度呈现“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故而在此期间进行改制,由联邦制转变为单一制,实现了由学会治理模式向科层治理模式的转变。

三是提升办学层次。香港中文大学在扩展知识生产广度的同时,积极挖掘知识生产的深度,主要是大力提倡科学研究,发展研究生教育。1965年学校开办教育学院,旨在训练学位教师。虽然最初只有一年制教育文凭课程,用以培训中学高年级师资,然而却是研究生课程的源头。1966年学校正式成立香港地区首所研究院,开设硕士学位课程。由此可见,香港中文大学从成立之初即非常重视科研和研究生教育。

四是重视大学的国际性。李卓敏校长曾专门阐述了确立国际性大学这一目标的主要考虑:“我们如果要成为一所有声望的大学,就要成为国际大学界和学术界的一分子,而且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学术水准。所谓世界水准,就是获得世界学术界的承认,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定义,换言之,这全是承认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只能从大学的教师的素质、研究成果和毕业生的工作表现来衡量各大学,从而加以认定。”^[14]聘用各方面关系都很好的李卓敏,对以融会中西学术为使命的香港中文大学来说的确很重要,他非常重视学校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地位,竭力聘请世界各地专家担任专业发展顾问和校外评审委员,积极推进学生海外交流计划。时至今日,海外交流计划已经成为学校组织哲学和文化的一部分。

1976年,第二份《富尔敦报告书》被呈交大学监督,建议香港中文大学须对教学与发展方针、财务管理、大学入学考试、聘任教职员、拟定课程、举办考试及颁授学位等负起责任,并加强高级教务人员参与治校。《报告书》特别建议学校提供“学科本位”(subject-orientated)与“学生本位”(student-orientated)两种教学模式,务求两者均衡发展。“学科本位”模式由教学院系负责,“学生本位”模式由成员书院负责。这一时期,香港中文大学开始由古典学术传授为主向现代专业教育转变,并在管理体制上完成了松散联邦制向统一科层制的转变。

3. 转型时期:医工学科大发展(1976—1997)

随着香港产业形态由技术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

转变,对科技专业人才的需求空前强烈。20世纪60年代末,制造业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年青一代实业家留学美国后回到香港,大力发展以美国技术和美国市场为主且主营代工生产的电子信息产业,使之在1981年成为香港第二大产业。同时,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香港经济向内地转移——制造工序北移,香港地区转型为向这一工业体系提供服务的经济体。^[15]

在这一背景下,第二任校长马临和第三任校长高琨先后带领香港中文大学突破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主导格局,增设医学和工程学科,分别成立了医学院和工学院。医学院创始于1976—1977年,在著名生物化学家、第二任校长马临推动下,由政府立法筹备,1981年招收首届医科学生。工学院则由光纤通信之父、第三任校长高锟于1991年推动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任校长的研究领域与学校新增的学科是一致的。这一时期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现代大学管理构架。1976年由联邦制改为统一制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的组织形式逐步完成统一。马临校长在任期间,学校行政权力达至顶峰,学院权力微弱,行政架构缺乏灵活性;高琨校长1987年到任后,学校的行政权力部分下放到院系,院系自主权逐步落实,行政效率开始提升。

二是实现了教学型向研究型的转变。随着在科研方面取得更大发展,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开始设置哲学博士学位课程,1982年颁授首批学术博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虽然很早设立了研究院,但前期研究生占比很低。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先后开设了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和电子学的学术博士学位课程,到20世纪90年代,学士学位以上学生已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六分之一,此时该校已不再是只提供本科教育的四年制学院,而发展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了。^[16]

三是扩大了学科覆盖面。先后增设医科和工科,成立新书院,实现了由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医学院,首办兼读学士学位课程,今天已成为突破性医学发现和外科新技术的发源地。1992年药剂学院成立。1986年学校成立工科教育咨询委员会,筹办工学院。委员会建议开设综合工科课程,聚焦电子学、电子计算学、资讯科技、计算机辅助系统工程四大学科领域,相关课程已于1988年陆续开设。

1991年工学院成立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有能力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服务全人类福祉。^[17]基于快速发展的需要,继三所创始书院之后,香港中文大学于1986年成立逸夫书院,直至21世纪初,学校仅此四所书院为成员书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变化的环境推动大学向综合性、研究型方向转变,但香港中文大学的遗传基因始终未变,即融通中西的大学使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坚持科教融合。

4. 融合创新时期:学科交叉整合(1997—)

大学的综合化通常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表现为学科数量的扩展,第二层次则是多学科交叉融合进而发生质变,形成新的学科生态系统。从文理基础学科拓展到应用文科、工程学科和医科,是香港中文大学综合化转型的第一个阶段。而该校真正的综合化,即拓展分化基础上的学科交叉融合是最近20年才逐步进行的。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翌年香港中文大学于全港率先录取内地本科生,进入新的发展转型期。回归祖国以来,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产业日益向旅游与金融业集中。在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下,香港经受住了1997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经济基本面稳固。^[18]毗邻香港的珠三角地区以科技为主导,高新技术蓬勃发展,逐渐攀居世界制造产业链的中高端,形成了包含不少特色项目和企业的先进产业生态系统。近年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综合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深度融入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客观上也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科交叉融合提出了要求。如果说前30年香港中文大学遵循“办大学就是办学科”的发展思路,那么近20余年学校则奉行“问题比学科更重要”的理念,期间学校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扩展学科、院系和书院。1997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先后成立了酒店管理学院(1997年)、中医学院(1997年)、公共卫生学院(1999年)、中医中药研究所(2000年)、法律学院(2004年)、建筑学院(2009年)。2000年以来,学校先后负责开展了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选定的24个卓越学科领域中9个领域的研究,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深入,学科生态系统不断完善。2006至2007年,为解决恢复四年制本科课程而增加的三千多名本科生的管理问题,书院规模迎来建校以来最大扩容,香港中文大学新增了晨兴、善衡、敬文、伍宜孙、

和声五所书院,书院秉持“学生本位”理念,持续发挥在通识教育方面的作用。

二是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香港中文大学积极探索大湾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在内地设置分校,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增强。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成立。2014年教育部正式致函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依法进行管理,深圳大学为内地合作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所传承香港中文大学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的独立的大学,前期开设理科、工科、经济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同样采取书院制,将香港中文大学几十年的成功办学模式移植到内地,旨在培养一批有国际视野、有社会担当的创新型专业人才。2019年1月,深圳市政府、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

三是注重中游与应用的跨学科研究。随着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也在发生战略性转变,逐步由面向学科和论文转变为面向问题、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20]《香港中文大学策略计划2016—2020》中也提到,香港特区政府已预留20亿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用以资助院校进行更多中游及应用研究。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在科研方面更加注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也更加强调跨学科研究。以领先世界的科研强项为本,香港中文大学确定了四大战略性研究领域和16项优先研究的跨学科主题:一是中国研究领域,涵盖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文化的根两个主题;二是转化医学领域,涵盖遗传学、基因组与精准医学,干细胞生物学及再生医学,大脑与思维,中西医结合,创新医疗技法及器材五个主题;三是资讯与自动化科技领域,涵盖智能推理和认知科学、机械人研究、大数据和在线学习的研究、网络编码四个主题;四是环境与持续发展领域,涵盖智慧与可持续城市,气候变化,植物分子、细胞和农业生物学及食物安全,再生能源和自然资源,人口研究(迁徙、青少年发展及老龄化管理)五个主题。^[21]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先后获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了五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06年成立转化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旨在对亚洲人中常见的癌症进行生物学研究,以期癌症发生早期即能确诊,并提出有效的诊治方案;2008年成立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致力改良中国种植水稻的品种,以提升稻米产量;2009年成立药用植物应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专研中医中药现代化及生物科技于医学的应

用;2010年成立合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新型合成物的设计、合成与应用,亦致力于发展环境友好的化学合成新方法;2013年成立消化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致力提升消化道肿瘤和其他消化道疾病的诊治水平。^[22]五个重点实验室旨在推动跨学科的基础研究。应该说,香港中文大学发展至今,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特色越发突出了。

三、分析与总结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科综合化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1963—1997)主要实现了学科领域的拓展,表现为学科门类增加、办学规模增大。在这个时期,香港中文大学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在传统文理基础学科的基础上,首先新增了工商管理、统计等应用文科,进而向医学与工程科学领域扩展,实现了从文理学院向多科性大学的转变。二是在古典人文知识传承的基础上,发展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实现了从传统人文教育向现代学术教育的转变。三是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实现了从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这个时期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变革的主要特点是同质化,环境因素是组织同质化的动力。一方面,大学是资源依赖型组织,为了获得办学资源,大学必须回应社会需求,与外部环境保持同构;另一方面,向综合性大学模式转型的动力也来自更大的文化环境,为了增强学校的合法性,香港中文大学倾向于模仿英美著名大学,而在英美高等教育体系中,最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就是刘献君教授所说的“以共性求生存”。

第二个时期(1997年至今)主要是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表现为学科的融合与创新、学术水平显著增强。在这个时期,香港中文大学着力推进三大转变。一是由多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21世纪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一方面继续拓展和优化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进学科的整合与创新,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传统学科现代化和数字化。事实上,学科综合化不是简单的学科门类的增加,更应是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实现学科创新。二是推进由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型大学的转变。随着人类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在单一学科领域生产学科知识、理论知识的研究型大学模式正在为在多学科背景下生产跨学科知识、应用知识的创新型大学所取代。因此,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科发展不再囿于纯理论研究,而是强调研究要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聚焦应用引发

的基础和技术问题,学校与产业界的联系因而日趋紧密。三是推进由国际化向本土化的转变。大学要实现国际化首先必须本土化。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中文大学积极践行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办学、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战略决策。1998年在全港率先面向内地招收本科生,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创立,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成立,这些举措皆是如此。这个时期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变革的主要特点是分化与创新。遗传因素是组织分化与创新的根本原因。一个方面,全球化时代综合性大学的“共性模式”与本土情境相结合,会发生转化与重组,从而产生具有个性和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新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大学建校之初确立的文化会对后续的组织变革产生持续性影响。组织文化塑造了大学的认知方式,大学认知方式一般体现为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由于组织的认知方式不同,组织对环境的解释、对综合性大学的理解也不一样,这是组织创新的内在机理。这亦是刘献君教授所说的“以个性求发展”。

由此可见,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科综合化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香港中文大学从成立发展至今,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包括国际大环境以及香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进行综合化变革。在实施综合化变革的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既注重巩固和发展传统优势学科,也通过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打造新的优势学科。在成立之初,香港中文大学主要是通过文理学院传授人文知识。后开办岭南商科研究所和教育学院,这是学校增强学术性专业教育的开始^[22],随着工商管理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等一系列专业学院先后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亦由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大学转变成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遗传基因是建校之初确立的。正如吴伦霓霞在总结香港中文大学成功经验时所言:“究竟是什么机缘巧合驱使中文大学勇往直前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校成员书院所具有而现已结合起来的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令香港中文大学别具一格的文化传统。强调高素质教学的重要性、鼓励学术研究,以及对结合中西文化之坚持,凡此种优良传统,把一批优秀的学者汇集到一起。他们怀着坚强信念、满腔热忱,加入中大工作,形成一支有强大内聚力、尽忠职守的队伍,并且日益壮大,这种精神素质凝聚成中大精神,赋予我校一种毋庸置疑的特性,持久不衰。”^[24]变化着的环境是在国际国内大背景下逐步展开的。随着

全球产业转移渐次推进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形态依次经历了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科技密集型、创新密集型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是推动香港中文大学学科发展与组织变革的外部驱动力。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功,在于保留鲜明特色的基础上成功进行了发展转型,将“放眼世界,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作为使命,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遗传基因,也是学校在历史潮流中笃定前行的不竭动力。

香港中文大学的变革与转型可以为内地文科见长大学的综合化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一是巩固并增强传统优势学科的实力。对于已经具备卓越品质的传统学科,如中国研究、经济与金融等学科,香港中文大学始终予以优先发展,使之迅速取得国内外领先地位。二是培育新兴优势学科。虽然生物医学科学、信息科学、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等新兴学科在香港中文大学一度实力较弱,但因其未来发展空间很大,紧密关联区域重大战略需求,香港中文大学亦将其列入优先发展领域,并且聘请这些领域的卓越学者担任校长,总体规划,系统布局,从而使这些学科迅速成长为新晋优势学科。三是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再创新。为了推进跨学科研究,提升学校的综合优势,香港中文大学近20年来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借助融合创新在转化医学、资讯与自动化科技、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交叉领域形成发展优势,推动了传统学科现代化和数字化。

注释:

- ① 香港本地中小学实行中英文双规体制,但在高等教育层面只有一所以英文为授课语言的香港大学,那些主要以中文授课中小学的学生若未能升入香港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以前可赴大陆接受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 [1] 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滕大春, 滕大生,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7.
[2][4][9] 周光礼, 黄容霞, 郝瑜. 大学组织变革研究及其

- 新进展[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2, (4): 67-74.
[3] 周光礼. 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治学引论[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49.
[5] BURBULES N C, TORRES C A.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M]. Cri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5.
[6] 詹姆斯·杜德斯达, 弗瑞斯·沃马克. 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 刘济良,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7.
[7] STROMQUIST N P, MONKMAN K.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Contestation Across Cultures[M].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0: 142.
[8] CZARNIAWSHA B, JOERGES B. Wind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How Ideas Translate in Objects and Actions[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1995, (1): 171-209.
[10] 香港发展史[E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8d9a4832b90d6c85ec3ac68b.html>.
[11][13] 张扬. 亚洲基金会: 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5, (3): 91-102, 127-128.
[12][15][18] 薛凤旋. 香港与内地: 回顾香港的经济展[J]. 当代港澳研究, 2017, (1): 17-51.
[14] 李卓敏. 题词[J]. 中文大学校刊, 1983, (4): 6-7.
[16][17][23][24] 吴伦霓霞. 迈进中的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三十年[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 46, 129, 46, 252.
[19][21] 香港中文大学策略计划 2016—2020[EB/OL]. <http://translate.itsc.cuhk.edu.hk/uniTS/www.cuhk.edu.hk/strategicplan/2016/tc/>.
[20] 周光礼. 双一流建设的三重突破: 体制、管理与技术[J]. 大学教育科学, 2016, (4): 4-14, 122.
[22] 香港中文大学概况 2019—2020[EB/OL]. <https://translate.itsc.cuhk.edu.hk/gb/www.iso.cuhk.edu.hk/images/publication/calendar/2019-2020/html5/chinese/toc/>.

(本文责任编辑 李晓宇)